

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各项文化事业

刘春子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广义上讲, 基督教进入中国, 前后共经历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清末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四个阶段。清末期间, 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达到了鼎盛。多数对基督教发展史的研究, 主要放在了对天主教的研究上。所以, 本文重点对基督教新教的发展及各项传教事业进行整理、研究。让人们在全面了解基督教新教发展的同时, 对基督教也有个进一步的认识。本文主要是对外国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情况为研究对象, 并从基督教自身的发展, 客观地反映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 及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所做的贡献。

关键字: 基督教新教; 传教事业; 土地; 教育

中图分类号: B979

文献标识码: A

基督教是公元 1 世纪时脱胎于犹太教的一门宗教。公元 1054 年, 东、西教会大分裂, 基督教在原有教派的基础上形成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大派系, 在 16 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中, “教理”正是改教的主要内容,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就针对基督教的教理进行了改革, 基督教新教也由此产生, 他也成为改教的奠基人。基督教的“教理”就是一种教义, 是从《圣经》的教训之中演展出来, 又被全教会所公认, 并向全会众宣布, 证明是出于神的权威。当提到教理时, 就是指: 一种坚定不移的, 当众宣布出来的决断或神的预旨。有的时候也指学术上不言自明的真理, 或是指已经建立的, 公认为正确的哲学定理; 又指政府的公告或由教廷规定的宗教教条。“教理”的英文是 dogma, 来自希腊文的 dokein。如果在希腊文中说 dokeinmoi, 意思乃是说: “在我看来”, 或是“是我所喜悦的”; 但也有以下的意义: “我已经坚决地决定了某一件事, 所以那对我而言是既成的事实。”所以, 教理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获得最大的福音。改教前的教理: 早期教会的教理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真理的混合思想, 所以不能视为纯粹的基督教教理。改教后的教理: 最重要的一点是改教者认为所有真正的宗教教理完全是基于《圣经》, 而且惟独出于《圣经》。

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在中国起步较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807 至 1842, 是基督教新教传入的开创时期。

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苏格兰人, 1806 年毕业于英国高士坡宣学院 (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 1807 年 (清嘉庆十二年) 他受英国伦敦布道会的派遣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方面, 马礼逊最大的贡献是 1815 年至 1822 年出版的巨著《五车韵府》(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即《华英字典》, 是英语系统的第一部华英字典。此外, 他还倡导西方学者对汉学的研究, 在华 25 年, 先后出版英文书籍 21 种之多, 其中有 3 种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等; 它们都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期刊; 1813 年, 《旧约全书》及早已译成并发行的《新约全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 马礼逊也成为第一个将基督教教义完整地介绍给中国的人。1823 年, 马礼逊回国度假时, 曾带回中国图书约 1 万册, 1834 年病逝时, 他的遗嘱将其全部中文藏书捐赠给伦敦大学的前身大学学院, 并以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任教的修德牧师 (Rev.S.Kidd) 出任大学汉学讲座五年为条件。所以, 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是应该予以高度评价的

第二个阶段: 1842 至 1901, 是基督教新教大举进入中国的时期。可分为五口宣教时期 (1842—1860) 和内地宣教时期 (1860—1900)。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传教条款”的保护下，纷纷涌入中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受各国国外传教会差派大举进入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来华的外国传教会竟达到 130 多个。这些传教会从国籍上说，主要分属于英、美、德、加拿大等国。从教派来说，主要分属于圣公宗、浸礼宗、公理宗、信义宗、长老宗、监理宗以及内地会等。

第三个阶段：1901 至 1937，是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复兴时期。可分为全盛时期(1900-1920/1895-1927)。

在一些不平等条约的容许下，传教士可到内地传福音，而且传遍全国各地区，黑龙江、西藏，贵州、云南等等。就是在这时，许多传教士来到内蒙古地区，在这里广传福音。

一、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在内蒙古的发展

如上所述，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决定开放广州、福州等五个沿海口，作为通商口岸。1858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又开南京、汉口等通商口岸，此时方规定基督教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从那时起，基督教新教在各省、市、县、甚至乡村遍设教堂传教。而内蒙古地处边疆，因交通不便，与内陆其他省市相比则传入的相对较晚。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则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62 年至 1902 年，是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准备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传教士在内蒙古各地旅行及经售宗教书刊。

当时，传教士是以游行布道和派发传教刊物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传教，以观察不同地区对基督教的反应，如果某地传教效果良好，便会在该地开设福音根据点，并购买堂址作长期的工作。

1862 年前后，第一位来到内蒙古的传教士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戴德生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中，父母都是循道会（Methodist）的信徒。受父亲的教育，他从小就被中国的文化深深吸引，并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将基督教的福音传入中国。

1857 年，戴德生成立一个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差会，即“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其目标是把福音传入内地。1862（同治 2 年）年前后，戴德生来到包头镇郊区沙尔沁村传教，传教点最初设在村西街路北侯记院内。信教的人有 30 多人。资料不足以证明，戴德生来内蒙古的准确时间，可以推算，戴德生 1862 年前后来内蒙古。内地会是一个没有宗派的宣教团体，他们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并尽量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中国化，他们不借政治势力而凭爱心传教。在教难中，他们不要求英政府庇护，更拒绝人命赔偿。情愿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在经济上不借贷、不募捐、完全仰赖神的供给。1866 年前后，戴德生带来了 20 多位男女宣教士，并将他们分配到 10 个省，内蒙古地区也分配了 2 名。

此时，内地会已在中国设立了 50 个教会，训练了不少中国传教士。到他离世的那一年，内地会宣教士已增至 828 名，分布在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内蒙古，西至新疆，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 2500 人。从 1866 年至 1905 年，这 39 年中，因内地会的福音工作，中国信主的人数达到两万，而且都是很忠实的信徒。1853 年，戴德生首次来到中国，从那时起至到离世，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他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在此以后，不少外国传教士相继来到了内蒙古传教。

1882 年（光绪 8 年），瑞典牧师鄂必格夫妇来到包头镇萨拉齐沙尔沁传教。同年，美国人高理生在此地传教卖书，他租了召拐子街一人巷的一间民房，出售《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个单行本。

1887 年（光绪 13 年），英国内地会宣教师华国祥来归化厅（今天的呼市）租赁水渠巷，永宁号院内的房子开设耶稣教堂，后又在东顺成街租房设立医院。

1888 年（光绪 14 年），宣教师们在包头镇（今天的包头市）建立驻地。

1892 年（光绪 18 年），瑞典协同会牧师喜理。雅格逊奉归绥宣道会之命，在德胜堡设堂传教，后迁入丰镇城。

1893 年（光绪 19 年），欧洲各国先后来到归化的男女传教士 60 多人传教，因而基督教传至相邻各旗县乡镇，并将旧城县府街的教堂进行了扩建。

1898 年（光绪 24 年），美籍瑞典人费安河（又名费尔灵顿）在五原县的大余太，扒子补降传教（现乌拉特前旗新北镇）并建立教会。

第二个阶段：1902 以后是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正式传入阶段。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冲击了全国各地的教会，教堂被焚烧，一些传教士和信徒被害，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或逃往外地。当时内蒙古的许多外国传教士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少数外国传教士，经外蒙古回到了欧洲。

当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割地赔款，教堂再次被恢复。当时内蒙古中部地区属山西省所管，山西省当局派来官吏与教会中的中国牧师高大林等对内蒙古各县的教堂，教友进行宣抚，并带来大量白银，按教堂和教友们的损失情况作了相应的赔偿。因此，各地教堂又开了门。瑞典和美国的传教士又大批地来到内蒙古重理教务，进行传教。

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以前，内蒙古西部地区仅有瑞典与美国教会设立教堂，而瑞典在八国联军中是中立地位的角色，所以，瑞典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事业与全国相比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1903 年（光绪 29 年）5 月，瑞典牧师鄂必格来到原萨拉齐镇（今天的包头市土右旗）传教，先后在城内洋人巷（现革新巷）及大西街路南传教，后购买了面积约 20 市亩的房产，建立教堂。

1904 年（光绪 30 年），美国籍瑞典牧师费安河，由俄国返回达拉特旗（现乌拉特前旗新北镇），在扒子补隆赔占地区 425 顷后建立教堂。

1907 年（光绪 33 年），萨拉齐教会在东门外购地 50 亩，做菜地和坟地（义坟），用以埋葬死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和去世的婴孩。

1917 年，瑞典传教士阎德生购得吕祖庙东面一处房产，兴建大礼拜堂（后称西堂），萨拉齐县的瑞典牧师瑞闻生做监工，经费由瑞典差会支付。

1920 年（民国 7 年），由瑞闻生设计监工，在萨拉齐城内大西街路南的宅基地上先后建起大小礼拜堂四座 76 间，同时还兴建了办公室、谈道所、教室等于 275 间。

1925 年（民国），瑞闻生由萨拉齐县来到包头，先住在西堂，后买下了大圪料街 22 号的南北大院一所，该院原是车马店，又叫筒子店，有土房 70 间，稍加修缮后作为谈道所。

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事业的这两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区别，1900 年以前，外国传教士在内蒙古仅仅是租赁土地进行传教。而 1900 年以后，他们在内蒙古有了土地所有权，传教事业就蓬勃展开。土地问题，一方面有利于传教士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但是，土地对传教士们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各项文化事业

医疗与教育是在华传教事业的两大支柱，但从数量及普及程度上比较，医疗工作远不及教育。谈到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方法，我们有必要对基督教新教的传教系统进行一下了解。

传教系统的基本单位就是差会。一个差会初抵中国时，通常是先在他们入境的城市建立起传教总部（Mission，又可称为传教区），包括办公室、传教士住宅和训练中心、教堂等。这些地方一般交通通讯较为便利，成为他们与母国差会联系及补充资源的所在地，也是整个传教区的指挥中心。此外，有些差会在内陆某地开辟了一个理想的传教工作场后，为方便就近指挥的缘故，而将总部迁入内陆。

所以，大致上，一个差会将其传教的地区作如下的划分：

最低层的是根据点，即一个乡镇的福音堂或布道所；其上为传教基地，多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如县城），以统筹数个根据点的工作；基地以上是传教总部，称为传教区（Mission）、或主教区（Diocese）、或长老区会（Presbytery），按不同宗派而有不同的名称。

毫无疑问，地理与交通，以及语系区的范围，是一个差会在某地区扩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天然屏障和界限是传教士无法突破的，只能结合实际相应调整。所以，差会在一个地区所设立的传教总部统辖的传教范围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任意扩大。这个差会可以在中国不同省份建立多个传教区（如华南教区（South China Mission）、华中教区（Central China Mission）、华北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等内蒙古地区就是属于华北教区的范围。

总部—基地—根据点，这样一个三级制的模式构成了传教事业的主要架构，一切工作都是按着这个架构来布置的。如在教育方面，在根据点内附设的学校，要不是早期的[一人主理学校]，便是后来简陋的走读学校（day—school），由受过传教中等教育的本地老师负责，程度仅为初小。基地内由于有传教士留驻，故所办学校便能仿照西洋近代教育的模式，有历史、地理、数学等学科，学校程度大概是高小至初中不等。至于传教总部内，通常不止一位传教士驻守，人力物力皆较充裕，故高等中学、神学院乃至第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大学皆汇聚于此。医疗服务方面的情况也很相似，大规模的传教医院仅设在总部之内，基地或许会办有门诊所，根据点则不可能有任何服务提供。

下面从这个三级模式再分析内蒙古地区的传教系统。

华北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就是传教总部。

瑞典国内地协同会在内蒙古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城市的教堂。其中有萨拉齐（土右旗）、丰镇、归化城、包头四座城市，这四个城市就是传教基地。

萨拉齐教堂作为传教基地，在乡村中设立传教点，有沟门教堂、苏波罗盖教堂、沙尔沁教堂、竹乐沁教堂。这些教堂都有传道士、长老，常驻在教堂进行传道，传道士的工资与其它经费都由萨拉齐教堂担负。

1915 年，萨拉齐基督教三妙女校成立。学校主要招收育婴堂的婴孩上学，校长是瑞典人达理白。学生使用的课本有当时通用的《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等。办学共同 35 年，毕业学生 1000 多名。

1934 年，萨拉齐教会在沙尔沁创办“育英小学”，学校开始设在候记院内，后迁到教会院内，共分甲、乙、丙、丁四个年级，学生共有 50 人左右，学生常是满班满室，教员三人。学校开设课程除一般课程外，每星期讲一节圣经课。经费除收一部分学费外，皆由教堂补贴，教学质量与县立小学并驾齐驱。1948 年停办，共毕业学生 3000 余名。1950 年冬天，育英小学与沙尔沁的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县立小学。同时，1939 年，教会租赁永泉巷 2 号一处房子，即聚德成后院建成了“八福工厂”（八福即《圣经》中《马太福音》的教导人遵行圣经的话语），厂内共有工人 40 多人，有技师教技术，男学徒织布带、毛布等物品，女学徒织地毯、花边并刺绣。

此外，1905 年，萨拉齐教会还建立了一个孤儿院，即三妙救婴院，专收民间不养育的婴孩与弃掉的婴孩。孤儿院中另设立学校，有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及师范班，有的孤儿送往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山西等地学习医学、神学，有少数培养成为高级医师者。到 1945 年，孤儿院共收孤儿 1029 人，其中男婴仅有 13 人。每一个婴儿在瑞典国都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他们的抚养费就由这些外国基督徒提供。当时，凡是往救婴院送婴儿的人，每送一婴儿得赏 200 文。解放前夕停止接收婴儿。为了孤儿院婴孩食品的需要，教会还在萨拉齐东门外设立了东门外菜园，供应蔬菜；在西牛营设立了米面加工厂，供应米面，名为仁妙米行，对外也出售米面。萨拉齐东门外还建立医院一所，其中有主体大楼一座，内包括医护人员宿舍，近一百张病床，医疗设施较齐全，医院辅助科室俱全，配备锅炉暖气、门诊住院均甚方便。

1928 年，萨拉齐基督教办起了“华洋义赈会”，地址设在教会院内小礼堂。华洋义赈会的负责

人是瑞典牧师毕德顺和鄂仁义，华洋义赈会将粮食定量配购给穷人，并在城镇设了四个救济区，每区设一个粥厂。每天到粥厂吃饭的穷人约数千人。

日军占领萨拉齐县前后，萨拉齐基督教会成立了基督教会戒烟所。当时，萨拉齐县吸大烟的人很多，教会就先后两次成立戒烟所。进戒烟所的戒烟者每批 40 人左右，以一月为限，目的就是帮助染有大烟瘾的人戒掉烟瘾。

萨拉齐教堂总负责人是瑞典牧师鄂北格（Pastor Gusdov Oberg）牧师夫妇。他们全部的精力都投在了内蒙古这块土地上。据记载，武昌起义后，山西革命军司令阎锡山率领大军进入内蒙古西部，当攻打萨拉齐时，县太爷闭城固守。双方交战数日，最后清军不支，城内混乱，当时由鄂北格高举红十字旗出城讲和。双过双方协商，清军必须开城投降，革命军对县官不加杀害。之后县官携带家属十余人避入教堂，革命军完全占领县城，双方所有伤兵都移入教堂由医疗室医生给以治疗，县官宣布退位。这件事也是传教士参与社会活动，为当地社会的稳定所做的一份贡献。

丰镇教堂是又一个传教基地，并在县城以外的隆盛庄、得胜堡、天成村、园子沟、麦忽图等地设立传教点，并有传道员长期住在此地进行传教事工。丰镇教堂主要由瑞典传教士（Pastor John）夫妇负责。教堂设在大西街，其内设计了大礼拜堂和牧师宿舍、办公室，外院还修造了传道员及工人宿舍。教堂内设立了孤儿院，专门收养民间弃婴，他们长大后有的习艺，有的姑娘则出嫁。Pastor John 夫妇还在教堂内设立诊疗所，免费给人治疗，县城群众多去就诊。

归绥城教堂传教基地分别在白塔、讨不气、朝岱、五路、脑包、公喇嘛、毕克齐、铁帽、三两、武川县城、六合营、水泉、乌兰花、和林县城、清水河县城、兰家房、凉城县、托克托县设立传教点，并建教堂。归绥城教堂主要负责人瑞典牧师麦理直（Pastor Malich）牧师夫妇。教堂设在大县府街临近西河沿儿，后出大价在通顺街购买一所粮店大院，扩大修建，建成一座大礼拜堂，院内共有四十间大的范围。在通顺街教堂内设立医务室，瑞典女牧师瑞惠荪为人看病，特别是为妇女接产，日夜不分，并训练中国女信徒学习产科技术。教堂内设立培真高小学校一所，校长是中国信徒王保。办学特别认真，教学水平很高，当时在归绥相当有声望。学校教员都是由师范学校毕业生中聘请而来的，由外国女教师教授英文。学校中备有军乐队，盛极一时。

当时，绥远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国民军中有基督教协进部，负责牧师为中国牧师陈崇贵、专负军中传道之责。国民军又称为西北军，麦理直与西北军的关系很好，时常邀请西北军领导人带领军队来教堂参加礼拜。同时，西北军的弘道学校是培养传道员毕业后给军队讲道的。西北军最高领导人冯玉祥加入了基督教，国内称他为“基督将军”。西北军中还有张之江，也很热心于基督教。张之江曾拿出一大笔钱，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他印了几十万本精装圣经，圣经表面上印有“此乃天下之大经也”，并刻有“张之江赠”的金字。他将这些圣经送给西北军中凡识字的尉级以上军官每人一本，又送给教会的信徒许多本。如果能找到此《圣经》的版本，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29 年至于 1930 年，绥远省遭遇大旱，粮食不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当时，美国、英国等基督教界人士合作成立“华洋义赈会”，从山东、河北买了大批粮食运来绥远，给灾区人民发放。义赈会对城市居民低价出售米面，每日在许多地点熬粥给贫民就食。他们还带领中国传道员到各县散发粮食，以赈灾民。他们先后给武川、卓资山、和林、托县、包头、固阳、安北、五原、清水河等地运去大批粮食，或者开票令灾民来归绥领取粮食。

包头教堂传教基地在古城湾、鄂尔克逊、沙尔沁、固阳县、哈尔忽洞等地都设立支堂，也就是传教点，并设有传道员传道。包头教堂地址设在包头城内西梁上，规模不小，还设有初级小学。后又在包头县城内圪料街造了一座教堂和住宅院，规模宏大大堂皇，还开建了两个讲道外堂，一个在圪料街，一个在草市街。负责教会的中国长老执事们大多为包头有名商人，他们经常请宋尚节、杨绍棠、王明道等国内外基督教有名的传道家来包头讲道。如宋尚节（1901-1943），在福建省兴化府的莆田县出生，父亲宋学建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他是一位牧师。他有十一个兄弟姊妹，排行第六。当时兴化一带教会大复兴，有二、三千人信主，因此他父亲的工作十分繁忙，十三、四岁的宋尚节已开始代父讲道，当时有“小牧师”之称。十八岁那年，他去了美国念化学，并且考获第一名。但

他后来放弃了深造和留美工作的机会，去了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毕业后，他就一心想着回国，当船抵达中国海岸时，他把奖状、博士证书等全部抛下海去，表明他轻看世界名利，立志作个传福音的使者。宋尚节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开始时，他在家乡一带布道，三年后往全国各地布道。1935年，开始到南洋一带布道，他所到之处，教会复兴。正是这样的布道家努力地传教事业而工作，当时包头教会很兴隆，教友人数大量增加，达到800人左右。

教会还在吕祖庙西堂外院建立“恩育小学”，最初十几个学生，后人数增加，学校教授国文、算术等课，学生免费入学，教学质量优良，在包头声誉甚高，受到家长的赞扬和社会的好评，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1952年，恩育小学与私立纯慈小学合并，改为公办的包头市十三初小（现为牛桥街第二小学）。

美国国内协同会在扒子补隆、卓资山、集宁设立传教基地。

扒子补隆（原安北县）和五原县教堂，教堂内建造了住宅，后购置土地二十余顷种植粮食。美国国内协同会与瑞典国内协同会不同的是，他们的传教对象是广大蒙汉群众，主要是蒙古人。特别是礼拜日聚会讲道时，蒙古人前来听道，教会预备饭食招待，并送给第一个人现洋一元。教堂中还设有学校。曾请蒙古教师教授蒙文，有许多学生受到初级教育。与此同时，美国人认真学习蒙语，学好后，就用蒙语讲道，也外出到蒙旗许多地方传道，他们与蒙古人同住蒙古包、吃蒙古人的饭食。而且，教堂中还设立医疗室为蒙古人和汉人治疗。在当地，蒙古王爷上层与美国人也有交往，他们赠送牲畜礼物给美国人。当时，教堂信徒人数多至数百人。另外，居住在包头、萨拉齐、归化城的瑞典牧师常去五原、扒子补隆避暑游玩。

美国国内协同会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了三个传道会。

一个是美国蒙古传道会（USA Mongolia Mission）。这个传道会的负责人是耿赛尔（Gancir），1933年前后，来内蒙古传教。他们居住在武川以北的召河的一座召庙中，专门给蒙古人传教。他们首先学习蒙语，后与当地蒙古人来往。同时，耿赛尔擅长医学，他还为蒙古人治病，而听道的人渐渐多起来。直到日本入侵内蒙古后，这里的传教工作便受到了影响。同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传教事业也进入了停滞状态。

另一个是美国福音会（USA Gospel Mission）。1921年，这个传道会来到中国，他们先在福建省传教。1925年前后，分派出一批美国人来到卓资山。卓资山福音会总会设立在卓资山县城，还在土木尔召、旗下营、乌兰花、陶林县、白音查干、豪塹等地设立传道点，并在分会设了传教员。创办人梗直夫妇，随同的女传教士是克美恩。他们在当地购买土地十八亩，建起围墙，大兴土木，建礼拜堂一座，高大钟楼一座，及外国人住房五十余间。教会中设立小学一所，聘请教员，广收教会信徒子弟及教外儿童入学。教会内设立了医务所，免费给县城人民及农村人民治病。

第三个是集宁美国信乐会（USA Fieth Happy Mission）。1923年，传道会在集宁南门外建立教堂。并购买了约十五亩多土地，建造礼拜堂一座、宿舍楼一座及小学教室多间。教会内设立小学一所，吸收教内外儿童入学学习。没有设立支会和乡办教会。

特别是，这些教会每年夏季都会在归绥、萨拉齐或包头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夏令聚会，召集各地教会的牧师、传道员、及信徒等，人数可达五六百多人，并准备食宿。会期聘请国内外基督教界名我来讲道，如宋尚节、陈崇桂、计志文等，有的是神学院院长，有的是留学英、美、瑞典等国的有名牧师。因此，举行这样一次大型聚会，影响很大。另外，这些教会派往国内外神学院的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前后共有百余人。学院有山东华北神学院、天津圣经神学院、山西洪洞神道学校、上海江湾女子神学院、湖南长沙圣经学校、内蒙古的归绥神道学校、萨拉齐神道学校等。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县城或乡镇中任传道员，终身之职，他们的子女教会设法培养，从事各种职业。

综上所述，基督教新教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传教事业仍有相当的基础，在传教事业发展的同时，传教士们在内蒙古地区的教育、医疗、慈善工作等都为当地的群众带来了益处。

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的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里仅十九世纪的传教士为

例。如晚清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对象是社会上的低下阶层。这除了导致整个传教策略都带着慈惠性质外，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基层中间，接触到的绝大部分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黑暗面：愚昧迷信的风俗（庙宇林立，满街偶像）、残忍荒谬的行为（缠足、杀婴、畜婢）、环境污秽、卫生恶劣、盲目无知、故步自封，还有政治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正、教育泯灭个性等等。这些现象构成了传教士笔记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的主要素描。那么，无疑的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亦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笔下也有类似的主记述。但是这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注意。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时，还全面研读传统儒家的典籍，并积极与一些士大夫交往，他们有机会发现中国理性和理想的一面，因此他们对中国有较平衡公允的评价。而更正教的传教士接触的既全是黑暗的一面，兼且又以[异教主义]来一笔抹煞传统中国的道德伦理价值，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当然是一面倒的予以否定了。古伯察神父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所见所闻，亦是许多负面的感受。蒙古地区的落后，表现在交通，生活，教育，环境等各方面。

中西文化的相互融会：大部分传教士，都认定西洋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西洋社会和科技知识的进步，与基督教信仰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中国若要西化（Westernized，即近代化），就必须首先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但也有部分传教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种种困难，主要是因为整个文化的环境都是被异教所笼罩。因此，西化中国是基督教化中国的先决条件，传教士们就投身于协助中国西化改革的运动中。传教士们不论是把教育视为传教的手段还是视为传教使命的一个表达形式，教育与传教同时成为他们办学的目的，这时的教育已在若干程度上摆脱了传教的桎梏，而取得了自足性的意义。教育的意义和地位愈来愈重要，甚至已凌驾于传教以上。与此相类似的是，传教教育只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典型，在其他传教事业的部门里，不管是医疗还是各项的服务，服务本身都逐渐取得自足性的意义。那么，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的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也是取得了自足性，发挥了自身的优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蒙古地处祖国边疆，是蒙、汉、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相对于沿海开放城市，各种咨询较封闭。传教士们在这里办学，客观上也会有许多困难。但是传教士们却扎根在内蒙古办学，当地贫苦大众才有机会学习。正如法国汉学家沙百里博士所言：“在大清帝国礼法使基督徒们参加者科举的行动变得很困难时，关心学习和为他们国家服务的许多信徒，都学习了外语并初步学会了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且教会教育注重整个青年的陶冶，宗教、道德、伦理、物理、社会等那一样都不能偏废。因此，宗教教育就是养成一个人做人的人格，使他能勇敢趋向做人的目的。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都是受过教会正统培养的人员，他们从入选至参加传教事工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的内蒙古地区教会教育开创了文化教育的先河，培养了当地的人才。来内蒙古的传教士，他们一方面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带到了这里，同时，传教士们也学习蒙古语与蒙古人一同生活，他们也将蒙古文化带回了本国。

从教会教育方面而言，这里的教育已超越了传教本身，由于传教士们大多精通天文、地理、语言等，他们才可以留在传教点，他们先透过科学知识来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事实上，十九世纪来华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差不多每个传教士都能讲流利的汉语和写通顺的中文，在内蒙古地区甚至还学会了蒙语，他们能从事翻译圣经和字典的工作，这里当然也包括蒙语。特别是当内地会来到内陆城市，来到内蒙古后，他们所接触的对象就是贫苦大众，这也是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在传教策略上的差异，但对我们来说，结果就是上层人士与大群众都接触到了基督教的教育。

目前，我有机会认识了两位当时在育婴院长大，并受教会学校培养的老人，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知道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培养了他们，他们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明显得就是文化人，可惜得是，当时他们使用过的课本都不存在了，否则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教育内容进一步研究教会教育。但在可能的基础上，通过老人们的口述来恢复当时的教科书，对教会资料也是一个完善。

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传教士来到这里。但是，国外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并进入到边疆艰苦的地区也是需要很大的挑战。对传教士而言，他们留在本国，相对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们选择来到中国。当来到中国，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沿海城市。这些传教士带着许多未知，只想将基督教的福音的带给没有听到的人。所以，凡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传教士们就要去，一代一代的传教士牺牲在这块土地上，像戴德生一样，五代都

留在了中国，并始终遵照《圣经》的话语，为中国福音的复兴而努力。他们的行动足以证明，他们深深地爱着中国。我们有理由给传教士们一个公平的评价。

参考书目

- [1] 李宽淑. 中国基督教史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 [2] 杨天宏.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3] 梁家麟. 福临中华—中国近代史十讲[M]. 1988.
- [4] 伯克富. 基督教教义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 [5] 杨大春. 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4.
- [6] 张先清. 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M]. 1993年.
- [8] 赵文良. 马可波罗行纪[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 [9] 隆德礼. 西湾圣教源流[M]. 1939年北京西什库遣使会印字馆排印.
- [10] 古伯察. 鞑靼西藏旅行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 [11] 波兹地涅耶夫. 蒙古及蒙古人[M]. 第二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 [12] 王守礼著, 付明渊译.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M]. 北京: 上智编译馆, 1950.
- [13] 曹毅之. 内蒙古西部地区基督教之沿革[A]. 内蒙古文史资料[C]. 第二十三辑.
- [14] 王学明. 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A]. 内蒙古文史资料[C]. 第二十二辑.
- [15] 约瑟夫·藩·赫肯著. 蒙古两旗的争端与天主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A]. 米济生译, 载《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三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2.
- [16] 前岛重男. 基督教在内蒙古—以厚和为中心的概况[A].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C]. 第2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 [17] 戴学稷. 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一个实例[A].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C]. 第1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 [18] 宝玉. 赔教地始末[A].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 内蒙古垦务研究[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 [19] 绥远通志稿[M]. 卷81 宗教·耶稣教.
- [20] 刘映元. 天主教在河套地区[A]. 史料忆述[C]. 第1辑,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1968.
- [21] 张辉敬. 关于天主教[A].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C]. 第四辑.
- [22] 吕德民, 范承祖, 曹黎光. 基督教在呼和浩特[A].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C]. 第十二辑.
- [23] 刘秉义. 萨拉齐基督教的形成与变化[A].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C]. 第四辑.
- [24] 杜瑞. 发生在廿四顷地教堂的几件事[A].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C]. 第一辑.
- [25] 韩振中. 近代包头天主教[A]. 包头史料荟要[C]. 第四辑.
- [26] 刘敬武. 基督教传入包头及其发展梗概[A]. 包头宗教史料[C].

[27] 张熙兰. 集宁教区圣母献堂修女会简史[A]. 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C]. 第一辑.

[28] 樊守信. 我所知道的舍必崖天主教的几件事[A]. 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C]. 第三辑.

[29] 吕德明. 内蒙古自治基督教志[M]. 2007 年.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various cultural undertakings

LIU Chun-zi

(Research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hristian into China, and experienc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also in Jingjiao temperature can be taught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the Catholic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four stag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reached the peak work.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ainly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sorting and research.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mainly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work as a research object, and from the Christian own development and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Inner Mongolia region,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Inner Mongolia region of contribution.

Key wor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Missionary work; Land;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9-01-08;

作者简介: 刘春子 (1982-),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